



哈贝马斯论 《审美教育书简》

2006年2月17日 来源: 论坛主题

作者其他文章

栏目广告6, 生成文

件 HTDOCS/NEWXX9. HTM 备用,

曹卫东译

来源: 译自《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席勒从1793年夏天开始写作《审美教育书简》，并于1795年把它发表在《季节女神》（Horen）上。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已经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由此看来，较之于在图宾根结为挚友的谢林、黑格尔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憧憬，席勒的这部作品已经领先了一步。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发挥出统一的力量，因为艺术白看作是一种深入到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当中的“中介形式”（Form der Mitteilung）。席勒把艺术理解成了一种交往理性，将在未来的“审美王国”里付诸实现。

席勒在第二封信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一步，是否不合时宜，“因为，当今，道德世界的事务有着更切身的利害关系，时代的状况迫切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

席勒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暗含着这样的答案，即艺术本身就是通过教化使人达到真正的政治自由的中介。教化过程与个体无关，涉及到的是民族的集体生活语境：“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换成自由国家的民族那里才能找到性格的整体性”。艺术要想能够完成使分析的现代性统一起来的历史使命，就不应死抓住个体不放，而必须对个体参与其中的生活形式加以转化。所以，席勒强调艺术应发挥交往、建立同感和团结的力量，即强调艺术的“公共特征”（der Offentliche Charakter）。席勒对现实的分析结果是，在现代生活关系中，个别的力要想彼此分离和得到发展，就必定会以牺牲它们整体性为代价。

这样一来，古今之争又成了现代性进行批判自我确证的出发点。古希腊的诗歌和艺术“虽然也分解人的天性，把它放大以后再分散到壮丽的诸神身上，但是，它不把人的天性撕裂成碎片，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混合，因为每个单独的神都不缺少完整的人性。这同我们现代人完全不同！在我们这里，类属的图像也是放大以后分散在个体身上——但是，是分成了碎片，而不是千变万化的混合体因而要想汇集出类属的整体性就不得不一个挨一个地去询问个体”。席勒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制度”。他的措辞使人想到青年马克思。席勒认为，不尽物化的经济过程像一架精巧的钟表，使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彼此脱节；独立的国家机器也是像钟表一样机械地运转，它使公民成为异己，并通过“划分等级”把公民视为统治对象而纳入冷漠的法则。批判完异化劳动和官僚政治之后，席勒随即转向远离日常问题的理智化和过于专门化的科学：“当思考的精神在观念世界里追求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时，它在感官世界里必然成为一个异己者，为了形式而丧失了物质。当务实的精神被关闭在由各种客体所组成的单调的圈子里，而且在这个圈子里又被各种程式所束缚，它必然会看到自由的整体在他眼前消逝，同时它的范围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抽象的思想家常常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他的任务是分析印象，而印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会触动灵魂；务实的人常常有颗狭隘的心，因为他们的想像力被关闭在他职业的单调的圈子里，而不可能扩展到别人的意

向方式之中”。

不过，席勒只是把这种异化现象看作是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人类无法摆脱它而阔步向前。对此，席勒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一样深信不疑。他甚至毫无保留地使用康德先验哲学的目的论的思维框架：“只是由于人身上的各种单独的力都彼此隔离，并都妄想独自立法，这些单独的力才与事物的真理进行抗争。并强使平常由于怠惰和自满自足而停止在外部现象上的共同感也去探究事物的深邃”。和社会领域中的工作精神一样，精神王国中的思考精神也各自为政。这样，在社会和哲学中便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立法。感性和知性，物质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的这种抽象的对立使被启蒙了的主体承受双重限制：即自然的物质强制和自由的道德强制。主体越是毫无顾及地力图控制外部自然及其内在自然，这两种强制也就越是明显。因而，自发的动力国家和理性的伦理国家最终彼此隔膜；两者只有在压制同感的效果上是一致的，因为“动力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可能，因为它是以自然来抑制自然；伦理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必然，因为它使个别意志服从于普遍意志”。

由于这个原因，席勒把理性的实现想像成为遭到破坏的同感的复兴；它不能单独从自然和自由任意一个中形成，而只应出现在教化过程中。为了终止立法机构的斗争，教化过程必须一方面使物质性格摆脱外部自然的任意性，另一方面使道德性格摆脱自由意志。教化过程的中介是艺术，因为艺术产生一种“中和心境”（*einemittlere Stimmung*），“在这种中和心境中，心绪既不受物质的也不受道德的强制，但却以这两种方式进行活动”。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性越来越卷入到强大的需求系统和抽象的道德准则中；然而，艺术却能赋予这种分裂的整体性以“一种社会特征”，因为艺术参与了这两项立法：“在力的可怕王国和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活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之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

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甚至对直到卢卡契和马尔库塞的整个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审美乌托邦一直都是探讨的关键。凭着这个审美乌托邦，席勒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当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促成了它进入一种沉思的唯心主义，但这种唯心主义对知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精神和自然之间康德式的分化并不满意，因为它从中窥见到了有关现代生活关系的分裂的表达。而在黑格尔和谢林看来，反思判断力的中介能力只是通向应当取得绝对统一性同意的知性观念的桥梁。席勒则相对节制，他坚持审美判断力的有限意义，以便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它加以使用。这里，他悄悄地把康德的判断力概念和传统的判断力概念混为一谈。传统的判断力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上（直到汉娜·阿伦特）从未完全失去与同感的政治概念的联系。因此，席勒能够从根本上把艺术视为一种“中介”形式，并指望艺术能“为社会带来和谐”：“一切其他的表象形式都会分裂社会，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和个别成员的私人感受发生关系，就是完全和个别成员的私人本领发生关系，因而也就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发生关系，唯独美的中介能够使社会统一起来，因为它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

接着，席勒在主体间性的两种对立的变形，即个人化和大众化的背景下确立主体间性的理想形式。离群索居者，其私人生活方式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社会也就成了外在于他的客观之物；混迹人群者，其表面化的存在也不可能寻找到其自我。这样，两种陌生化和融合化的极端形式同样都对整体性构成了威胁。席勒对两者的平衡比较浪漫，他认为，用审美统一起来的社会必须产生一种交往结构，“每个人只是当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才静静地同自己交谈，一旦走出小屋，就同所有的人交谈”。

但是，席勒建立审美乌托邦，其目的并不在于使生活关系审美化，而是要革交往关系的命。超现实主义者在其纲领中要求艺术溶解到生命中去，达达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也充满挑衅地这样强调；相反，席勒则坚持纯粹假象的自律。他同时期望审美假象所带来的愉悦能导致“整个感受方式”的“彻底革命”。但是，只要缺少现实的支持，假象就永远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假象。和席勒一样，马尔库塞后来也是这样确立艺术和革命的关系的。由于社会不仅在人的意识中，也在人的感官中进行再生产，因此，意识的解放必须以感观的解放为基础——必须“放弃对给定的客观世界的强制性亲近”。尽管如此，艺术仍不能完成超现实主义者的指令，艺术不应放弃其崇高特性而转向生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想像艺术的终结，即人们不再能够区分真和假、善与恶、美与丑。这也许是文明达到极点时所导致的彻底的野蛮状态”。后期马尔库塞重复了席勒有关生活直接审美化的警告：审美假象作为发挥统一的力量，仅限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人在理论上认真地抑制自己不去肯定假象就是实际存在，在实践中也不借助假象来施舍实际存在”。

这种警告早在席勒那里就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价值领域都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这一点后来被拉斯克（Emil Lask）和韦伯大力张扬。这些领域似乎已经获得了解放，它们“为自己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不受人的专断而欣慰。政治立法者可以封闭这

些领域，但不可能在其中进行统治”。我们如果不考虑文化的特性，而试图打破审美假象容器，那么，其内涵势必会模糊不定——失去了崇高特性的意义和散了架的形式也就无法发挥出解放的力量。对席勒来说，只有当艺术作为一种中介形式，一种中介——在这个中介里，分散的部分重新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发挥催化作用，生活世界的审美化才是合法的。只有当艺术把在现代已分裂的一切——膨胀的需求体系、官僚国家、抽象的理性道德和专家化的科学，带出到同感的开放天空下，美和趣味的社会特征才能表现出来。

文章添加：[消失的火](#) 最后编辑：

点击数:1960 本周点击数:4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消失的火

于2006-2-17 14:06:37

席勒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价值——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

作者：张玉能

德国伟大的诗人、剧作家、美学家弗里德利希·席勒已经逝世200周年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却仍然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在当代这样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下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同时并存的社会，席勒的文学、美学的遗产就具有更加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反思现代性

席勒是继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以后对于启蒙现代性进行最全面系统批判的思想家，而且他主要是进行的审美批判。不过他的审美批判是直接指向社会变革的。因此，尽管席勒营造的是一个审美乌托邦，但是他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却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改造的。所以，当我们来探讨席勒美学的当代价值的时候，首先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来审视和改造席勒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

所谓“现代性”，在我看来就是指的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为主要表征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性质。或者说，现代性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全球化历史过程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席勒作为从启蒙主义时代向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转换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美学家，继承和发挥了卢梭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在席勒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分裂、异化。在《审美教育书简》第6封信中他写道：“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而一旦必要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本性，现在让位给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构，在钟表机构里，由无限众多但都无生命的部分拼凑成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自己发动起来的齿轮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压在他的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了他的职业和他的知识的一种印迹。”（《席勒散文选》第170页）概括地说，现代性的分裂和异化主要就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分裂和异化。席勒为此寻找解决的办法，结果就找到了康德的哲学和美学。席勒想用审美（美、崇高、艺术）的教育解决现代性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分裂和异化。这就是“审美乌托邦”。

席勒把这种审美的人的状态叫做“审美的可规定性状态”，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0封信中指出：“如果我们把感性规定的状态称为自然状态，把理性规定的状态称为逻辑的状态和道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种实在的和主动的可规定性的状态称为审美状态。”正是这种审美状态使得人可以把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结合而成为游戏冲动，从而使人成为自由的人。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把美称为我们的第二创造者，那么，这不仅在诗学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哲学上也是正确的。”（《席勒散文选》第234—237页）但是，席勒却与康德一样把审美状态当作“自由意志”的心意状态，从而构筑的就必然是“审美乌托邦”。不过，席勒的愿望和思路倒是对于要彻底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有着直接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实践美学就可以在实践中本体论的基础上来把“审美乌托邦”改造成为“审美的家园”。

实践美学可以而且能够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的现实活动中，把握和运用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为人的生存发展的目的服务，超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实用功利，超越个体与社会的对立，达到自由的程度，形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达到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表现，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样，席勒的“审美乌托邦”就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成为了“审美的家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可以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病，健康而茁壮地发展。

坚持当代审美文化的先进性

席勒站在时代的前列敏锐地感悟到近代以来封建主义以及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现代性”的弊病，并且殚精竭虑地反思“现代性”而力图找到拯救人类及其社会的办法和途径。

席勒是信奉卢梭主义的，对于近代文化所造就的“现代性”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既不主张暴力革命，那就必然倡导精神革命或

文化革命。因此，在他那里，人类的“文化”就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认为，“文化远没有使我们获得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养起来的每一种力量都只是同时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席勒散文选》，第166页）。“正是文化给现代的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的经验和确定的思维使得科学的更明显的划分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国家这个更加复杂的钟表也使得等级和职业的更严格的区分成为必然的，那么，人性的内在结合就会被撕碎，一种毁灭性的斗争也会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同上，第169页）。但是，另一方面，席勒也看到，“要发展人身上的各种天赋才能，除了使这些才能相互对立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各种能力的对抗是文化的伟大工具，但无论如何只是工具；因为只要这种对抗还在继续，人就还是正处在通向文化的途中。”（同上，第173页）。也就是说，还是要运用文化这个工具来恢复人的人性的完整，克服近代人性的分裂和异化。“因此，文化的职责是双重的：第一，防备感性受到自由的干涉，第二，面对感觉的强制力而确保人格性。”（同上，第202页）。这就是“审美文化”或“美的艺术”才可以完成的职责。

席勒的这些设想当然充满着理想化和乌托邦，不过，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审美文化或者说审美文化的先进性是一种确实可行的办法和途径。

这是否已经给我们构建先进的审美文化提供了一些思路？所谓“先进文化”就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文化。在我们的现时代所谓“先进文化”和“先进的审美文化”就必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为根基的，融合了西方一切优秀的古今文化。这是席勒的审美文化论给我们的现代启示。正如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第9封信中所说：“有史以来，哲学家和艺术家就表明，他们是热心于把真和美注入普遍人性的深处的；那些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世界上消失了，但是真和美却以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胜利的拼搏向上。”（《席勒散文选》第183页）的确，我们必须像席勒所指明的那样坚持当代文化和当代审美文化的先进性。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在某些方面与席勒所批评的现代性初期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现在弥漫于社会和文化之中商业化、庸俗化、享乐化、身体化等等倾向就是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封信中所指出的：“现在需要正支配一切，并使沉沦的人类屈服于它暴虐的桎梏之下。实用是这个时代的巨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能也都要尊崇它。在这架粗俗的天平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而且艺术得不到任何鼓励，她便正在从本世纪的喧嚣的市场上消失。甚至哲学的研究精神也一点一点地从想像力那里抢夺地盘，而科学的界限越扩张，艺术的界限也就越缩小。”（《席勒散文选》第154—155页）因此，坚持当代文化和当代审美文化的先进性就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我们不能“躲避崇高”，也不可以“游戏人生”，更不能“玩文学”，“大话戏说历史”，也不应该把艺术活动变成“侵犯人类道德底线”的“残酷行为”，把影视艺术庸俗化为“下半身写作”或“身体欲望”。

全面自由地发展人的本质力量

席勒倡导审美教育就是要用审美文化（美的艺术）来克服启蒙主义运动以来人类的异化和碎片化的片面发展，这也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人的解放”以及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全面、和谐、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的先声和前奏。

席勒把美叫做人的“第二创造者”。他在《审美教育书简》21封信中说：“我们必须把在审美心境中归还给人的能力看作是一切馈赠中的最高礼物，即人性的馈赠。”“如果我们把美称为我们的第二创造者，那么，这不仅在诗学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哲学上也是正确的。”（《席勒散文选》第236—237页）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7封信中认为，“在审美国家里，人与人就只能作为形象来相互显现，人与人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面面对。通过自由来给与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惟有审美国家能使社会成为现实的，因为它通过个体的本性来实现整体的意志。”“只有审美趣味才能够把和谐带入社会之中，因为它在个体心中造成和谐。”“惟有美才会使全世界幸福，而且每个人，只要他体验到了美的魔力，他也会忘掉自己的局限。”（同上，第276—277页）简而言之，席勒认为，审美文化（美和美的艺术）可以使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使社会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席勒也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和最明确地做出了极有启发性的准确阐述。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0封信最后的一个注释中他指出：“能够出现在现象中的一切事物，可以在四种关系之中来加以思考。一个事物可能直接与我们的感性状态（我们的存在和健康）有关系；这是它的自然性质。或者它可能与我们的知性有关，使我们得到一种认识；这是它的逻辑性质。或者它可能与我们的意志有关系，作为一个为理性的人而选择的对象来对待；这是它的道德性质。或者最后它可能与我们各种不同的能力的整体有关系，而不应该是属于某一种个别能力的一个指定的对象；这是它的审美性质。……所以，有身体健康的教育，有智力认识的教育，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有审美趣味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的感性能力和精神能力的整体达到尽可能有的和谐。”（《席勒散文选》第234页）这无疑是在西方美学史上对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作的最完整、最准确的规定。用一句更加概括的话来说就是：“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本质力量的尽可能的和谐发展”。这应该是我们提倡审美教育的最终的目的。这些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当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具有着直接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我们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剧作家、美学家席勒逝世200周年，就是要把席勒的“审美乌托邦”逐步变成中华大地上的活生生的现实

[更多评论>>](#)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

| [设为首页](#) |

